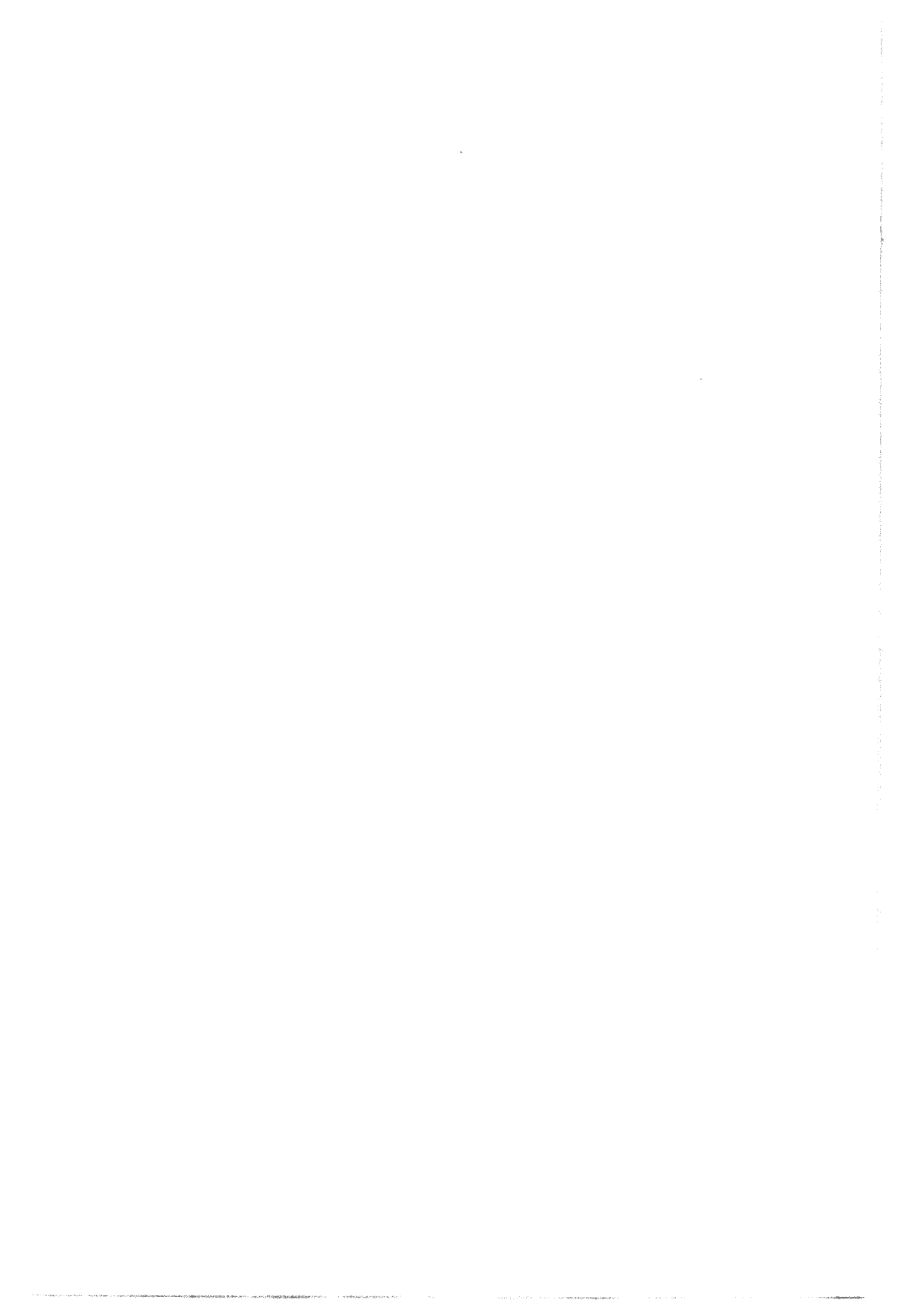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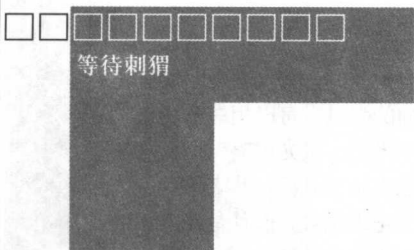
上篇
问学



□□ 等待刺猬

——当代学风的一种思想史分析

■ 移用以赛亚·伯林“狐狸”与“刺猬”的分析，去观察80年代所谈都是大题目，所论均为大方向的学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满街都是刺猬”。以学术史的眼光审察，这无疑“空疏”或“不规范”。但从思想史角度分析，其表象背后，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不仅是世纪末现象，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相交织的问题。本文将在分析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它的是非得失。



等待刺猬

一、洋典故的启发

伯林的比喻源于古希腊诗歌中的一个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对于这句难以索解的话，这位英国思想家用微言大义的手法，充实其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分析思想人物的学问性格上来，其个案就是写《战争与和平》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在伯林的笔下，“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现象采取一种整体把握的立场。具体说，就是将其所理解、思考及感受到的内容归结到单一的见解或中心原则上，致力于编排一以贯之的理论系统。任何零散的现象都需纳入其框架才能显示意义。“狐狸”则不然，目标不见得大，但可以多方面追逐、猎取。不同的成果可以没有联系甚至不完整或自相矛盾，其思想方式是离心而非向心的。伯林认为，有些人物性格类型很鲜明，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分别就与刺猬和狐狸对应；但另一些人，如托尔斯泰则不然。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但他却相信自己在

做刺猬。他的天赋和成就是一回事，而他的信念和后来对他的成就的解释是另一回事。《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情节，而非那乏味的哲理。这种误会或者“角色错位”，正是19世纪大体系的思想风气对托氏影响的结果。

鉴于这种说法的启发性，余英时教授将其移用到中国思想史的分析上来。不过他的对象不是20世纪，也不是19世纪，而是18世纪，即对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体现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上。那是乾嘉学术——即考据学鼎盛的时期，或者说是狐狸当道的时代。那个时代评价学问造詣的标准领域是考据，不善于或不屑于此行当，都会被排斥于主流学界之外。而余文中的两主角，却分享着不同的命运。章学诚是生在狐狸当道的时代而坚持自己本色的刺猬，故即使有天纵之才，也只能终于寂寞之中。戴震则不同，在那个时代就被推许为群狐之首，自然很风光。然而，作者要说的则是，戴震并非一只单纯的狐狸：“东原似乎从来不甘心把自己认同于‘狐狸’，然而长期处在‘狐狸’的包围之中，却使他不能不稍稍隐藏一下本来的面目，有时甚至还不免要

①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Fox", in *Russian Thinkers*, reprinted in Penguin Books, 1994, p.22.

和‘狐狸’敷衍一番。这样一来，就更使同时的人捉摸不定戴东原其人其学的真相了”。就是说，这是一只伪装成狐狸的刺猬。戴氏与托翁，情形恰好相反，只不过托翁是误会，戴氏则是“作伪”。余氏的分析，本是为说明清代考据的繁荣正是宋明理学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从而论证其“儒家智识主义”在清代兴起的必然性。把两只刺猬当作狐狸时代代言人的恰当性，这里不能加以评论，但其分析框架，则可作为我们进入20世纪学风讨论的方便法门。其启发性在于：

其一，人们可以看到学风不仅同个人的气质有联系，同时也跟时代风气有关联，即学风具有时代性，它对该时代多数人的治学方向有范导作用（包括对异趣者形成压力）。其二，如果我们同意“近代治学术思想史的人主要是以义理为评判学术成就的标准”的判断，那就意味着准备承认，20世纪是刺猬取代狐狸中心地位的时代。其三，刺猬与狐狸是相对而言的，其指陈必须在特定的背景中定位。沿用这个框架观察20世纪，不能局限于义理与考据的对立中，而必须寻求更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或学术现象。这一切，既得追溯纵向的历史根源，又需考察横向的社会背景。

二、世纪的转折点

18世纪狐狸当道，而20世纪刺猬得势。但横亘在两个时代之间，还有一个同样漫长的19世纪。它是狐狸与刺猬交接的过渡期。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可以看做刺猬登台的前奏。这个学派的宗旨是通经致用，其开创者为庄存与、刘逢禄，而最能表现经世热情的是其后继者，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从思想史看，新今文经学是儒家经学三型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三型就是分别以今文、古文及宋学为代表的经世、考据及义理之学。用现代术语讲，三者分别体现了政治、历史及哲学的不同特征。这三种形态的发展是经学的内在矛盾同社会政治的演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但明末清初以后，又出现依次为宋学、古文、今文的倒卷帘式的回潮运动。当今文经学再次出现时，实际上是要回到其原始基地——董仲舒奠定的经世之学上。

参阅拙著：《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及《被解释的传统》（与单世联、张永义合作，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新今文学派推崇董仲舒，高谈公羊三世说，讲究历史运会之类，从学风讲都有刺猬的性格特征。这是思想家面对社会危机的时代性反应。就龚、魏而言，龚氏本从其外祖父、戴震的传人段玉裁学《说文》，受古文学的训练。后来宗今文，谈经以讥评时弊为特色，呼吁变法，实是受时政刺激的结果。魏与龚并誉，除《书古微》、《诗古微》讨论经籍，在学术上为今文派张目外，也是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从龚、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刺猬意识的出现是同变法的愿望，即对整个价值系统的改造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但是，龚、魏都想以复古为变法的途径，表明在那个时代的局限下，他们想做的只是老式的刺猬。真正大刺猬的出现，要到那个世纪末。

不消说，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一号的思想人物要数康有为。他集今文之大成而将其余力发挥到尽头，真正做到“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不论《新学伪经考》的疑旧，还是《孔子改制考》的维新，一破一立，焦点都指向整个价值体系的合法性重建上。而那“秘不示人”的《大同书》，更是对未来人类生活作通天眼式的展示、安排。康氏那笼罩全局的眼光，真正具有刺猬的胃口。

康有为的思想事业，既有其个性的作用，也是时代变局

使然。梁启超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坚实之基础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学风如此大胆，武断，然也有众多的追随者，可见已是世风所趋了：“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谭嗣同闻“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学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其《仁学》更是天上人间、前生来世、科学宗教、中学西学一锅煮，大有吞云吐雾的气象。康氏重建合法性的努力未成功，但对旧价值系统的根基却掘下了最先、最深的一锄。此后，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刺猬角逐的时代便来临了。

对20世纪学风影响更直接的其实是梁启超。梁的自白很有意思。一方面，“启超与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移于他业，则又抛弃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三节。

同上。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年 第542页

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入焉而不深”。 以此而言，梁应是一只狐狸。但另一方面，“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然“平心而论，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思想界之陈涉”。 如此气概，似乎又更有刺猬的作风。或许可以这样说，就学问思辨的整体而言，他是一只狐狸，而从其局部论学的内容看，几乎每一分支都有刺猬的踪迹。这可以解释他做狐狸不够精细而做刺猬又不够联贯的特点。但是，他对20世纪学风的影响，实际在于他那笔端常带感情，为新思潮呼风唤雨的新文体上。这是宣传新价值的效果，刺猬的影响掩盖了狐狸的行径。

不能忽略严复。康有为援西入中而被目为异端，但真正公开把西学作价值尺度引入而全面抨击传统的是严复。严复的思想类型也得分析。就他对经验主义的推崇来看，当然颇有狐狸的气味。但当他用中西对比的手法批判传统时，则俨然是刺猬的行径：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节。

同上书第二十一节

夫自由一言，其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及为全受。……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之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①

这种以个别抽象观念为界碑划分中西文化系统，并借对比的手法提出社会价值转换方向的方法，在危机时代有强烈的宣传效果。跨入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康有为固有的套路已变得陈旧落伍时，严复的比较方法则一再被重复，激进者如陈独秀、李大钊，保守者如杜亚泉或梁漱溟，莫不如此。可以说，是严复开了东西文化异同优劣之争的先河。甚至到了80年代的“文化热”中，这种手法依然大行其道，大多数论说其实就是“五四”时代有关说法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重复而已。

《严复集》第一册《论世变之亟》中华书局 1986年 第1页

参见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等文（均收入《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以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从康、梁、严等戊戌人物在世纪转折点上的奋斗，可以看出，是社会危机的刺激，价值转换的渴望，召唤着刺猬意识。而刺猬意识首先不是表现为成果，而是体现为一种学风。

三、“主义”领先

戊戌时期的刺猬意识，可能多少有些自发的状况，“五四”以后，便变得十分自觉，动辄标榜“主义”的时尚就是证明。但是，即使是刺猬得势的时候，也有狐狸的身影、声音存在。古文大师章太炎、有古文血统又引经验主义为嫡亲的胡适，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章太炎经学上对康有为的批驳，堪称是狐狸对刺猬叫阵，然他这方面的影响停留在专业圈子中。所以鲁迅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批驳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值得一说的是比较

“新潮”的胡适。他是站在狐狸的立场上，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自觉向刺猬发难的人物。

尽管胡适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当他要求舆论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并非指任何具体的主义，而是各种各样的主义。简言之，是讨论思想方式或学风而非争论社会政治立场。焦点是反抽象，在胡适看来，主义是抽象的，谈主义不可避免会导致空谈，甚至会有混淆视听的后果。其最尖锐的责难是：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①

然而，胡适没有证明，“抽象”一定是空谈，更没能让人相信，其所列的问题的解决同任何“主义”无关。当胡适

①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问题与主义》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1年 第93页

把“问题”与“主义”同具体与抽象对位联系起来后，反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方法论入手，一是以经验现实为据。蓝志先与李大钊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但是，从方法论入手，还是要刺猬与要狐狸的争论；而对现实的分析，则可能变成要哪一种刺猬的主张。因此，蓝志先的论说更扣近我们的论题。

蓝志先从问题可以分具体与抽象两种意义，进而强调复杂的问题或大问题抽象的意义更重要入手，从而把问题与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有些事情，“从他根本的方面着眼，便成了抽象性的问题，从他实行的方面着眼，便成了具体性的问题”，例如：

旧制度和新理想的冲突问题：这种问题，大概通常称为革命的问题(广义的)。初起的时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恶方面争，即标示的改革方法，也决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一定是一种趋向的标准(这种标示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目标)譬如法国大革命时候所标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国辛亥革命时所标示的排满，算是具体的方法呢，还是理想的目标呢？

这可以不言而喻的。故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个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若是罗列许多具体方法，即就变成一种条陈，连问题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进行方针呢？于此可见问题不限于具体性。而抽象性的问题更重要了。^①

在他看来，所谓“主义”，就是抽象而重要的问题，在加入理想的要素以后，形成多数人行为标准或态度。所以，其结论自然与胡适相反：“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联；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毫无疑问，谈“主义”就是刺猬意识在其时的具体表现。明确地说，从思想方式看，它是强调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概括性的总体把握；而其社会功能，则是追求对价值原则（所谓“趋向的标准”）作根本的转换。一个时代的危机，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赖以维系的主义的危机。不过，危机的初步

^① 蓝志先《问题主义》《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前揭，第97页

^② 《魏源集》（上）《刘礼部遗书序》中华书局 1976年 第164页

反应，新主义意识未必很自觉，如戊戌时期，也就是笼统谈西学或新学，而到了启蒙的高潮，各种主义应运而生，群起争夺填补意识形态的空间。

从胡适的进一步反应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狐狸的思路及困难。其一，他反对蓝氏关于主义包括问题的抽象面及理想面（即态度）两方面因素的提法，而硬把“理想”说成“想象”：“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象的。譬如一个科学家，遇着一个困难的，他脑子里推想出几种解决方法，又把每种假设的解决所涵的结果，一一想象出来，这都是理想。”这就是无视主义具有表达社会政治立场的功能，实际也就排除解决社会问题需要的价值前提。难怪他一开始就把“学理”同“主义”相提并论。其二，在上述前提下，尽管他提及的许多问题，中国的如“大总统的权限”，外国的如“俄国新宪法，主张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矿产、水力、银行收归国有”等，本都是离不开主义即社会基本立场的问题，但他都可轻易地要求大事化小：“问题的范围愈大，里面的具体小问题愈多。我们研究时，决不可单靠几个好听的抽象名词，就可敷衍过去；我们应该把那太大的范围缩小下来，把